

我国政策体系下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研究

解贺嘉^{1,2)} 初景利^{3,4)†} 叶文豪⁵⁾

1)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100871,北京;2)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100871,北京;3)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100190,北京;

4)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100190,北京;5)南京农业大学信息管理学院,210095,南京

摘要 出版伦理是科技期刊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在我国大力推动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背景下,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尤为迫切。作为科研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应符合国家政策需求。本文全面搜集我国出版伦理相关政策,通过政策文献计量分析和扎根理论分析,明确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的演变、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理论模型、出版伦理政策的内容变迁。通过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可得如下结论:我国日益重视科技期刊诚信与伦理治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基本框架包括总体要求、出版伦理内容以及落实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后两者是关键要素。

关键词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科研诚信;政策分析;理论模型

Research on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ublication ethics in the scientific journals under the policy system of China//XIE Hejia, CHU Jingli, YE Wenhao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ethics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journal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scientific journals in China,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ublication ethics is particularly urgen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ublication ethic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should comply with national policy requirements.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collected relevant policies on publication ethics in China, and throug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olicy literature and grounded theoretical analysis, clarified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journals publication ethics policies, the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ublication ethic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publication ethics polici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esearch result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China is attaching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the integrity and ethical governance of scientific journals;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of publication ethics in scientific journals includes the overall requirements, the content of publication ethics, and th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ation ethics, of which the latter two are the key elements.

Keywords scientific journals; publication ethics; research integrity; policy analysis; theoretical model

First-author's addres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Beijing, China

DOI:10.16811/j.cnki.1001-4314.2024.01.006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旨在全面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包括内容质量、编校质量、出版形式质量、印制质量等^[1]。科技期刊发展的核心是质量^[2],出版伦理贯穿期刊出版流程,是全面提升期刊质量的关键,也是衡量编辑出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以及期刊专业管理能力的重要因素,对于加强期刊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建设^[3]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管理机构已经认识到出版伦理对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净化学术交流环境的作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4]、卓越行动计划^[5]中都提出加强出版伦理道德规范与科研诚信建设。2012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主办的1050种期刊联合签名并发布了《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关于加强科技期刊科学道德规范、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联合声明》^[6]。2013年,我国成立医学期刊编辑与出版伦理委员会,负责制定符合国际规范与我国国情的医药卫生期刊编辑与发表伦理准则。2015年,中国科协正式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7],明确科研人员的道德行为规范,防范第三方代写、代投、代改、虚假同行评议、不当署名的不端行为。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发布《关于促进学术出版科研诚信及伦理规范的声明》^[8]。2021年,中宣部组织召开学术期刊发展座谈会,强调期刊管理部门和主管主办单位加强对学术期刊作风学风建设等突出问题的治理。

我国讨论制定学术道德与科研诚信政策始于20世纪90年代。2018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出版伦理是政策文件关注的重点。在构建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战略中,我国政府部门制定了诸多政策推动科技期刊的发展,出版伦理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法律政策从顶层设计的视角,为我国科技学术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基础的、重要的参考和依据。本文全面搜集和整理出版伦理相关政策,通过政策文本量化讨论政策的演变和内容变迁,利用扎根理论构建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 通信作者

1 研究样本和方法

1.1 政策文本搜集与研究对象

政策是政府、政党及其他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一系列的法律、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为最大限度搜集相关政策,首先,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官方网站搜集期刊发展的政策;其次,在北大法宝以“期刊”为标题搜集相关政策,然后以标题为“诚信”“道德”“伦理”“不端”“学风”“规范”“准则”和全文为“期刊”“发表”“出版”“论文”进行两两组配搜集相关政策;最后用《科研诚信建设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汇编》《2020 有关出版的法律法规选编》2本书中的政策进行补充。截止到2022年5月16日,初步搜集到83份政策文件。随后,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政策内容涉及期刊编辑出版和论文发表的科研诚信、伦理道德要求、伦理道德规范、科研失信/学术不端、科研失信/学术不端的调查与处理,最终确定51份政策文件,构建政策文本库。本文进一步提取政策外部特征,以及摘录与期刊出版伦理相关的政策文本。

1.2 研究方法

1.2.1 政策文献计量

政策文献计量是量化分析政策文献结构属性的研究方法,它不同于传统政策研究范式对政策内容的关注,而是更多地关注大样本量、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政策文本外部特征的定量分析^[9]。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客观、可重现、可验证的研究结果,能够从宏观层面上清晰地了解政策演进规律、明确政策影响范围、把握政策发展趋势^[10]。本文以搜集的51份政策文件为样本,通过政策的发文时间趋势、机构发文数量、机构共现网络、政策内容变迁,客观呈现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的宏观情况与内容侧重点。

1.2.2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采用自下而上对理论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不断总结提炼概念范畴,用于研究者从资料中发展理论。扎根理论的内核是避免主观的假设,让理论成果从研究过程中自然呈现。扎根理论的分析过程包括: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资料进行比对、提炼、界定,形成初始概念和有效范畴;主轴编码,对开放式编码得到的范畴归纳聚类,通过主轴编码得到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选择性编码,在主范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炼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核心范畴,将各范畴联结。理论饱和度检验。随机抽取分析的文本进行编码,确保没有产生新的概念、范畴与关系结构^[11]。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内容自下而上进行逐级提炼和要素归纳,从而建构理论模型。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的演变

本文对51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文件的外部特征和内容进行量化分析,从而明确政策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

2.1.1 政策阶段划分

对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的年度发布数量进行统计。总体上呈现增长的态势,特别是在出现重大的学术不端案件后,政策会激增。根据政策发布数量的变化趋势以及重要文件的发布时间,将政策划分为3个阶段。

1)1992—2003年探索期: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处于起步阶段,政策数量较少,共5件。这一阶段,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主要从加强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自律和改进科技评价工作,提出对出版伦理的具体要求。1992年,国家保密局等机构出台了《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是第一份涉及期刊伦理建设的文件。2003年,科技部等5部门发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首次关注了科技评价中的学术不端,并提出学术惩戒措施。

2)2003—2012年建设期: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处于波动上升阶段,共发文14件。主要的发文机构为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该阶段,我国开始加大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建设的力度,出台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办法。

3)2012—2021年发展期: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共发文32件。2014—2017年,期刊规范化运营以及学术不端治理的政策相继出台。2018年至今,政策文件数量快速增长。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2019年,中国科协等4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的意见》,科技期刊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其中涉及出版伦理规范的要求。《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为相关主体应对学术不端案件提供了行为依据。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相继修订,特别强调了加强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制度规范,为出版伦理建设提供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法律依据。随着法律、党内法规制度等高效力级别政策的发布,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

逐渐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2.1.2 机构发布政策数量与共现网络演变

首先,本文对各机构发布政策的数量进行统计。先对机构名称进行规范:1)部委的文件保留到部委一级名称,例如“中国科学院传播局”规范为“中国科学院”;2)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保留到具体的一级名称,如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管理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依然保留其一级名称;3)已变更的机构名称,通过现行政府机构的官方网站中的“机构沿革”确定^[12]。机构发布的政策由牵头发文(包含独立发文)与联合发文共同组成,其中牵头发文38份,联合发文13份。

51份政策文件共涉及30个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是全国科技工作者的统一组织,所属全国学会主办或者参与主办的期刊数量达1000余种。中国科协高度重视弘扬科学精神,以及科学道德与科技伦理建设,发布政策数量最多,为15份,其中牵头发文12份,联合发文3份;教育部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学术道德治理,发布政策数量达15份,其中牵头发文6份,联合发文9份;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也是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排头兵,共发文13份,其中牵头发文7份,联合发文6份;科学技术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科研诚信建设,共发文11份,其中牵头发文7份,联合发文4份。此外,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政策的发布数量也较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也牵头发布相关法规政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机构也积极参与发布相关政策,对科研诚信、学术道德建设愈加重视。

接着,本文按照政策阶段对机构的协作关系进行分析,利用Python绘制机构共现网络,结果如图1所示。本文通过各节点的点度中心度和共现网络图来判断机构的贡献度和重要性。

1)探索期发布政策的机构较少,呈现分散协作的特点。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中国工程院之间的联合发文为主,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积极参与,国家保密局等形成了另一个合作网络。

2)建设期机构增多,呈现独立离散协作的特点。一方面,单独发布政策的机构增加,包括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署。另一方面,机构联合发布的政策数量较少。该阶段教育部发布政策数量最多,处于主导地位。除了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与科研诚信、学术道德建设密切相关的部门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等也成为协作网络节点。这个阶段对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以及学术不端的联合治理愈加重视。

3)发展期机构迅速增长,呈现紧密协作的特点。机构独立发布政策的比例下降,联合发布政策的比例上升,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制度达成高度共识,出版伦理建设进入多部门协同治理的阶段。其中,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度最高,在出版伦理政策发布上具有最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参与进来,在相关政策中含有“带牙齿”的处理条款^[13],使出版伦理相关政策更具威慑性和约束力。

在不同的政策阶段,教育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都是中心度排名较高的机构,反映了科研管理机构、科研机构、资助机构、科技期刊主管机构是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中的核心力量。

2.2 我国政策体系下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理论模型构建

2.2.1 分析过程

1)开放式编码。本文使用Nvivo12定性分析软件对原始资料辅助编码,构建政策文本的初始概念。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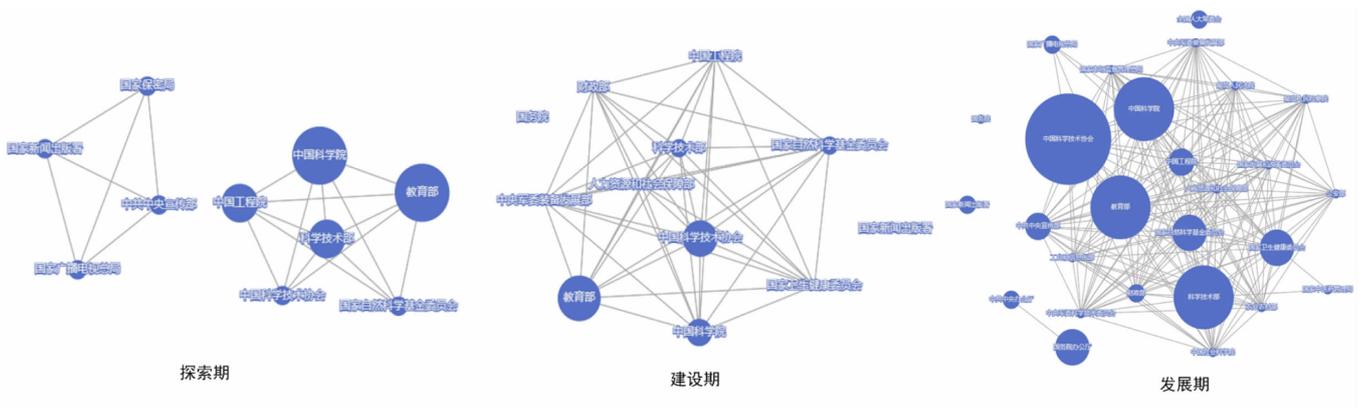


图1 不同政策阶段机构共现网络

体为,对提取的政策文本按照发布时间顺序逐句进行编码,将无主题的语句逐级提炼初始概念,并按照逻辑关系进行梳理,最终提炼了22个有效的初始概念,如表1所示。

表1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开放式编码

初始概念	参考点
a11 防范、抵制和惩戒学术不端	6
a12 加强诚信审核、监控学术伦理	6
a21 坚持科学精神	9
a22 遵守科技伦理规范	5
a31 科学数据规范	3
a32 作者署名资格与责任	14
a33 引用规范、致谢	11
a34 利益冲突披露	1
a35 重复发表	1
a36 基金标注	2
a37 更正与撤回	4
a38 论文传播	2
a41 同行评议原则	14
a42 建立合理的同行评议模式	4
a51 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22
a52 同行评议伦理失范行为	2
a61 制定出版伦理相关政策	5
a62 建立保密审查制度	2
a63 开展教育培训	3
a71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	9
a72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预防	6
a73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联合调查与处理	5

2) 主轴编码。主轴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结果的进一步归纳聚类,挖掘主范畴与子范畴之间潜在的逻辑关系,本文通过主轴编码得到7个主范畴,进一步对主范畴的内涵进行阐释。主范畴与范畴内涵如表2

表2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主轴编码

主范畴	初始概念	范畴内涵
A1 出版伦理建设要求	a11 防范、抵制和惩戒学术不端 a12 加强诚信审核、监控学术伦理	科技期刊加强对科技论文科研诚信、学术道德、科技伦理的引导、监督与审核,坚决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采用技术和有效的机制预防学术不端行为,调查与处理学术不端案件,并制定相应的惩戒办法
A2 作者学术道德	a21 坚持科学精神 a22 遵守科技伦理规范	科技论文作者作为科研人员要弘扬追求真理、诚实守信、实事求是、公平公正、互相尊重的科学精神,保持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严格遵守以尊重负责为主要特征的科技伦理规范,主动进行伦理审查,尊重人类受试者知情同意和隐私权,保障动物福利
A3 作者出版伦理规范	a31 科学数据规范 a32 作者署名资格与责任 a33 引用规范、致谢 a34 利益冲突披露 a35 重复发表 a36 基金标注 a37 更正与撤回 a38 论文传播	作者在科技学术论文创作、投稿、发表中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
A4 同行评议出版伦理规范	a41 同行评议原则 a42 建立合理的同行评议模式	在同行评议过程中,评议者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审稿人坚持学术评议的独立性以及客观、公正、及时、保密等原则,披露与回避利益冲突。编辑建立合理的同行评议模式,加强对评议过程的监督

所示。

3) 选择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提炼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的联结关系,并以“故事线”(story line)方式描绘行为现象与脉络条件,发展出新的实质理论框架。对7个主范畴进行归类,总结出3个核心范畴,3个核心范畴形成了典型的关系结构,并构成了我国政策体系下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理论模型。围绕“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这一主题,本文得到的选择性编码结果,如表3所示。

4) 理论饱和度检验。由本领域的另一名硕士生对政策文本进行逐一编码和分析,没有出现新的概念、范畴和关系结构。因此,可以基本判定上述模型达到理论饱和。

2.2.2 理论模型构建与阐释

基于对政策文本的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饱和度检验等步骤,本文构建了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该理论模型以出版伦理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以出版伦理内容为核心,以出版伦理规范制度和出版伦理失范的联合治理为保障,最终实现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符合伦理道德,服务于科技进步与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出版伦理内容指导作者、编辑、审稿人这3个主体自身以及在处理相互关系中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中,科技期刊面临复杂多样的伦理道德场景,需要出版伦理规范进行指导和约束。同时,

(续表2)

主范畴	初始概念	范畴内涵
A5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a51 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a52 同行评议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作者在学术论文创作、投稿、评议、发表、传播中存在的学术不端、学术不当等有问题的行为,例如抄袭、剽窃、篡改、图片操纵、数据造假等;编辑、审稿人在论文评议、发表中存在的学术不端、学术不当等有问题的行为,例如违反客观公正原则、保密规定、拖延论文评议等
A6 出版伦理规范制度	a61 制定出版伦理相关政策 a62 建立保密审查制度 a63 开展教育培训	将出版伦理建设纳入科技期刊业务体系,制定出版伦理规范,积极开展作者出版伦理教育以及编辑、审稿人的相关培训,建立和完善保密审查等学术诚信制度,构建学术不端案例以及规范指南资源库
A7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联合治理	a71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处理 a72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预防 a73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联合调查与处理	期刊管理部门加强对出版伦理的审核与管理,对发表大量低质量以及存在学术不端问题论文的期刊进行处罚。科技期刊、科研机构、资助机构等利益相关方联合建立预防、调查、处理、惩戒出版伦理失范行为的机制

表3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选择性编码

核心范畴	主范畴	关系结构	关系类型	关系内涵
出版伦理建设总体要求	A1 出版伦理建设要求 A2 作者学术道德	出版伦理建设总体要求 →出版伦理内容	指导作用	坚持科研诚信、科学精神、科技伦理、抵制学术不端等要求,指导出版伦理内容构建
出版伦理内容	A3 作者出版伦理规范 A4 同行评议出版伦理规范 A5 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出版伦理内容→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	核心作用	出版伦理规范要求以及出版伦理失范界定是否科学合理、全面系统,是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最关键与核心的部分
落实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	A6 出版伦理规范制度 A7 出版伦理失范联合治理	落实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 →出版伦理内容	保障作用	出版伦理规范制度和出版伦理失范的联合治理是落实出版伦理内容的有效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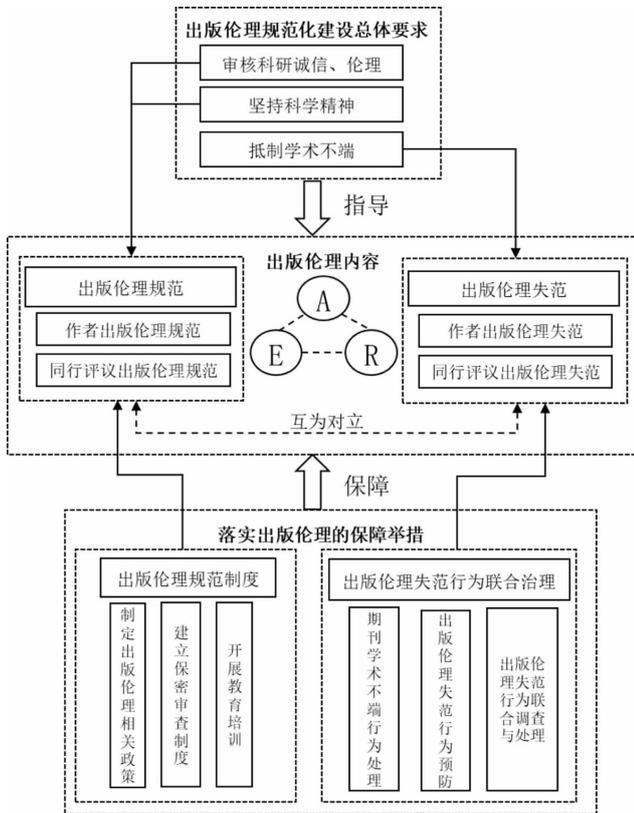


图2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理论模型

以出版伦理失范的界定,划定责任主体的红线和底线。出版伦理规范的制定应以科研诚信、科技伦理、科学精神等要求为指导,规范的落实需要出版伦理制度予以

保障;出版伦理失范的治理以期刊抵制学术不端的要求为指导,以科技期刊以及利益相关方的联合协同为保障。

2.3 出版伦理政策内容变迁

2.3.1 总体政策内容变迁

在提炼核心范畴的基础上,本文探究了出版伦理政策关注点的变迁。在不同阶段,政策都最为重视出版伦理规范和失范的具体内容,其次重视的是落实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并呈现不断关注的态势。出版伦理建设的总体要求在政策建设期和发展期才逐渐被关注。

2.3.2 出版伦理内容变迁

本文进一步聚焦于出版伦理内容的变迁分析。首先,利用 Python 对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进行规范处理与频次统计,如图3所示。3个政策阶段最重视的是伪造、剽窃、篡改、抄袭、不当署名、侵占。政策发展期新增并重视干扰同行评议、第三方代写代投代修、虚假同行评议等新兴的出版伦理失范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政策发展期,我国于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规定不得虚构、伪造科研成果,发布、传播虚假科研成果,从事学术论文和实验研究数据的买卖、代写、代投服务,为明确界定出版伦理失范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12个出版伦理规范主题的变迁如图4所示。3个政策阶段都较为重视署名、评议原则、引用、科学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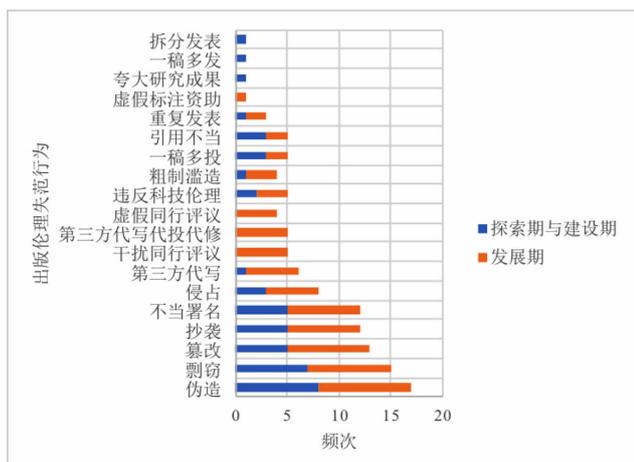


图3 作者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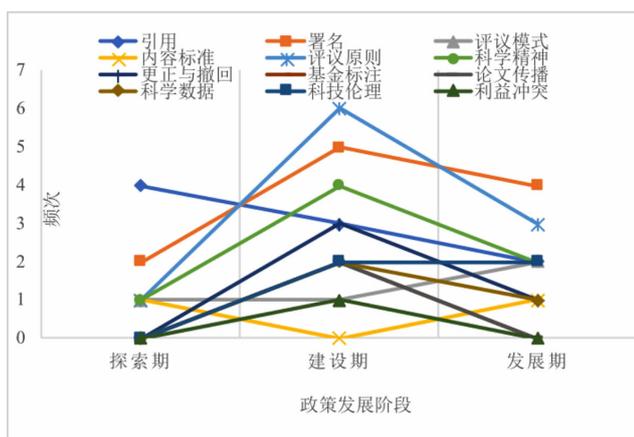


图4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主题变迁

政策探索期开始出现的评议模式、内容标准被重视程度相对较低。政策建设期新兴的更正与撤回、科学数据、科技伦理开始被重视。政策发展期基金标注、论文传播、利益冲突消失。

3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思路

3.1 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政策的量化分析,可以认为我国日益重视期刊诚信与伦理治理。表现在:政策发布数量不断提升;科研管理机构、科研机构、资助机构、科技期刊主管主办机构重视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多机构联合发布政策成为重要趋势,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呈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特征。

3.2 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基本框架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是以学术出版发展逐渐规范和学术不端频发为起点,其目标是规范与明确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和责任。在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版伦理规范、出版伦理失范、学术不端行为、科研诚信制度、学术不端调查与处理等逐渐成为关键词。

本文提炼了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包含3个核心范畴和7个主范畴,分别对应总体要求(审核科研诚信、伦理,坚持科学精神,抵制学术不端)、出版伦理内容(出版伦理规范,出版伦理失范)、落实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出版伦理规范制度、出版伦理失范联合治理),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基础框架。

3.3 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关键要素

在不同的政策阶段,出版伦理内容都是政策的侧重点,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也逐渐被重视,两者是实现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在出版伦理内容方面,关于出版伦理失范行为,我国相关政策划定了作者、编辑、审稿人在期刊编辑出版和论文发表中的底线,触碰到底线意味着学术不端;关于出版伦理规范,我国政策界定了12个规范主题,在不同政策阶段重视的规范主题有所不同。

4 结束语

科技期刊出版伦理是我国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层面的政策对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给予了充分指导。我国对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日益重视,科研管理机构、科研机构、资助机构、科技期刊主管主办机构发挥着重要作用。政策内容为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提供了基础理论模型,对出版伦理失范和规范主题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对出版伦理内容和落实出版伦理的保障举措更为重视。

下一步研究将结合我国出版伦理政策分析结果,对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范化建设实践情况进行分析,明晰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为推动科技期刊科研诚信与出版伦理道德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

5 参考文献

- [1] 新闻出版署关于印发《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的通知[A/OL]. [2023-10-10].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51815.htm
- [2]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 [3] 周志新. 基于 CiteSpace 的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研究现状及趋势分析[J]. 科技与出版, 2020(8): 129
- [4] 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实施方案[EB/OL]. [2023-10-10].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www.cas.cn%2Ftz%2F201606%2F20160628408307475677.doc&wdOrigin=BROWSELINK>
- [5]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9—2023年)

- [EB/OL]. [2023-10-10]. <https://www.scuec.edu.cn/xuebao/info/1011/1030.htm>
- [6] 中国科协千余科技期刊联合签名加强科学道德规范[EB/OL]. [2023-10-10]. <https://m.fx361.com/news/2012/0127/15947373.html>
- [7] 殷岳,梅深.中国科协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J].水道港口,2016,37(1):88
- [8] 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关于促进学术出版科研诚信及伦理规范的声明[EB/OL]. [2023-12-21]. <https://kjqbjxh.portallib.libsou.com/info/73924.aspx>
- [9] 苏竣.公共科技政策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 [10]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138
- [11] 温雅婷,余江,洪志生,等.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公共服务创新路径研究:基于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1,42(3):105
- [12] 冯凌子,刘敬,袁军鹏.我国科研诚信政策变迁计量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20,64(9):74
- [13] 印波.科技期刊编辑部在科研失信行为查处中的主体责任[J].编辑学报,2020,32(4):368
(2023-09-15收稿;2024-01-13修回)

《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首期入选英文期刊的计量指标分析及启示》审稿意见

1. 选题意义值得商榷,选题时机值得探讨。本文对2019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180种英文期刊入选该计划前后3年的发文数、国际论文数、影响因子变化等计量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介绍了优秀期刊办刊举措,概括了几点启示。这种单纯拿文献计量指标衡量资助项目成效的论文选题,是值得商榷的。发文数和国际论文数越多,影响因子等指标增长越快,期刊质量就越高,项目资助成效就越显著,一流科技期刊培育就越有成绩……这种思维逻辑、学术认知和价值导向,审稿人难以认同,因为它既偏离了国家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政策导向的初衷,似乎指标一流就成了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也不符合科技期刊发展规律,甚至可能掩盖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近几年这类选题有泛滥成灾之势,既引人关注,也令人深思。卓越行动计划以5年为一个资助周期,目前第一个资助周期尚未结束,本文在这个时候对入选该计划前后3年的期刊计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选题时机和采集统计数据的时段都未必合适。

2. 数据统计工作量大,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存疑。1.1节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以2019年11月‘卓越计划’办公室公布的180种入选英文期刊为研究对象,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主,Scopus数据库为辅,获取期刊2017-2019、2020-2022两个年段的发文数、国际稿源情况。”审稿人认为,这一表述极不严谨,数据统计的准确性也令人生疑,因为180种入选英文期刊中有30种“高起点新刊”,新刊怎么可能有这些数据?就连梯队英文期刊到底是98种还是99种,全文的表述都不一致。“对于某篇论文,只要有一位作者来自国际研究机构,则认为其为国际稿件。”这样的认定,又有多大意义?再说,我国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全靠西方数据库评出来的吗?

3. 学术观点不够明确,论述缺乏说服力。第2章“期刊数据分析”,主要是对计量指标的增减幅度进行统计,归纳分析和观点提炼并不到位,未概括出有价值、有说服力的学术观点。3.2节第1句说:“《意见》全文3500余字,有17处提及‘国际’,充分反映了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要求^[13]。”这样的表述让人难以理解。经查,标注的参考文献[13]的原句为“《意见》全文3500余字,有17处提及‘国际’,7处提及‘全球’,13处提及‘世界’,充分反映了中国科技期刊‘走出去’的决心”。

4. 第3、第4章几乎都为泛泛议论。第3章看似列出了优秀期刊案例,但多为蜻蜓点水,一两句话一带而过。第4章“启示”,表述缺乏针对性,既没有突出的新意,也难有可操作性。

5. 语言文字粗糙,表达不够严谨规范。文中许多重要概念表述含混或错误。例如:文章将卓越行动计划中的英文“梯队期刊”称为“英文阶梯期刊”,“高起点新刊”称为“高起点期刊”,“领军期刊”称为“顶尖期刊”,将入选资助项目前后的时间段称为“年段”。再如:将“科爱公司”称为“中国科学出版社和爱思唯尔(Elsevier)的合资公司科爱出版社”。又如:2.1节中说“首期入选‘卓越计划’的30种高起点新刊已全部正式创刊,其中2019年之前创刊的有8种,2019年创刊的有2种,2020年、2021年、2022年创刊的分别为6种、12种、2种”。请问这些期刊的“创刊”时间应该如何界定?仅在海外注册了ISSN未获批CN号之前也叫“创刊”吗?另外,论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也不规范,年份范围和数值范围中的连接号都误用短横线,没有分别使用规范的一字线和浪纹线。

审稿结论:不建议采用。